

对学做“农人”的点滴思考

香港CSA研习会启示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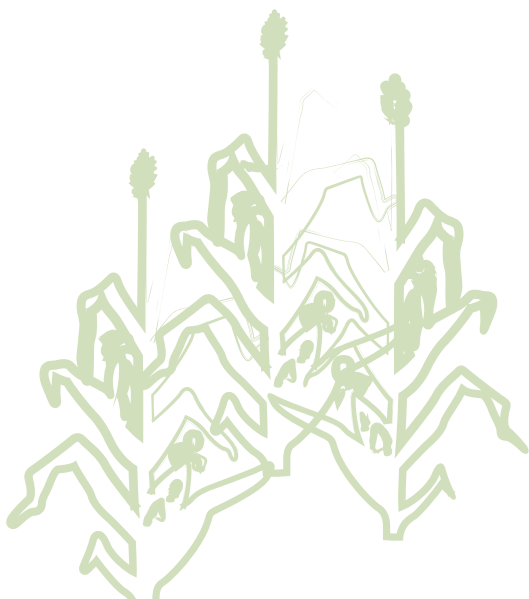
※ 罗燕

作者罗燕为重庆合初人文化传播社“生态农业·新农人实习计划”项目工作人员

2012年10月我以会议记录员的身份参加在香港举办的“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那时，我是重庆合初人自然农园^①CSA项目的配送人员。期间，我接到过消费者很不客气的投诉电话，遇到过农园蔬菜紧缺的时段，也碰到过合作农户对生态种植的摇摆心态。心想，这些疑问或许可以通过参加研习会来梳理清楚。然而超出我的想象，这次研习会的内容如此丰富，传递给我的力量如此强大，让我暂时抛开作为CSA配送人员所遇到的各种棘手问题，而更多的去寻找研习会上大家所讨论到的“农”的深刻内涵。在此，非常感谢研习会上的每位朋友，是你们给了我力量，继续前行的步伐。

锄头，农人的一张名片

这次研习会，我看到了那么明显的“农人”的面孔，有来自四川攀枝花的刘占红大哥^②，台湾湾宝的洪箱姐^③，香港菜园新村的冯汝竹大姐^④等等。他/她们的言行举止都体现着“农的价值”。我通过耳朵，眼睛和心感悟到了点滴。提笔时，我已是“生态农业·新农人实习计划”^⑤的工作人员。于是又尝试结合“新农人”^⑥的故事去思考怎样学做“农人”^⑦。



刘占红大哥跟我们分享了他从常规农民转变成生态农民的心历路程。刚发言，他就说：“我拿著话筒，比拿锄头还要重！”锄头是刘大哥最熟习的工具之一，因为挖地，种植，除草都会用到，只是形状不同而已。长年使用后，他可以轻松挥舞有好几斤重的锄头了。话筒则与他做农活无关，用的次数少，甚至不习惯用。这也就造成他发出“话筒比锄头还要重”的感叹。而他的这个感叹，让我思索著农人与锄头的关联。记得一位老农曾经跟我讲过：“看到用的锄头，就知道你这个农民勤快不勤快，合格不合格。”锄头经常使用，与土壤接触的部位就会发生摩擦，变得又薄又亮。如果闲置较长时间，锄头当然就变钝，甚至生锈。锄头俨然成为了农民的一张名片，铭记著他/她们辛勤劳作的风雨岁月。

而对于刚务农的新农人来说，要书写好这张名片又难，又不难。新农人张飞开始就觉得锄头很重，用不到两小时手臂就会酸痛。“举起锄头都有些费劲了，还要往地里挖。挖的深度和大小你还要好好控制。这个修地球的职业还没那么容易！”张飞说到的问题，新农人段清也同样遇到。全身有力量的段清使足了猛劲往地里挖，同伴还笑他是在为作物修又大又深的别墅呢！其实种不同品种的作物，需要挖不同规格的坑。而深度和大小的把握就在于你控制挥锄头的力量。你还要学会用不同型号的锄头，如长的，短的，宽的，平的。另外，修锄头，接锄把也是新农人需要学习的技术活。

想要像刘大哥一样用好锄头，只有多练习。几个月后，我去走访张飞。看到他已经很轻松地用锄头除草。我也去试试。可没想到我挖得太深，把没有长草根的土层也挖了起来，当然很费劲。他笑话我连除草都不会，还叫我伸出双手来。“你的手都没有起茧，你看我的手，肯定是你太懒了，没有经常挖地。”看著这双起茧的手就知道，他用锄头的频率比我高多了。他的技术也就这样练出来了。我很惭愧自己挥锄头的次数少，可嘴上还要辩解说那是因为在尝试免耕覆盖法，根本就不需要用锄头。

正是因为免耕覆盖法不需要很费劲地挖地，因而受到了大部分新农人的推崇。做短期新农人体验的可曼就认为，用锄头翻地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耕种方式。她参与了安龙村高家种土豆的全部过程。期间，她尝试说服高阿姨采用免耕的方法来种，可没能得到采纳。她有些失望，觉得传统农耕需要去糟粕存精华。务农十几年的青年农人肖大哥则提醒：“你们这些自称新农人的，刚开始学做农活就想著怎么省力又省事，用些从书本上学来的方法。我当然不是说这些方法不好，而是想说，你们应该先拿起锄头，去真实地体验挥锄头的感觉，真正体会农民吃苦耐劳的精神。不然你怎么当农民？”

锄头折射的不仅是务农的技术，更是农人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们这些新农人要玩转锄头，需要继承的便是锄头背后的这种精神。

守护心中的那亩田，那种生活

台湾湾宝的农民为保家护土长期抗争，最后终于抵挡住了政府征地的举措。洪箱姐作为代表就在会上分享了她的坚持抗争的动力。她说：“我觉得我很快乐，我做农四点钟去，那是我的权利，我可八点就回来，我可以主宰我自己，活得很有尊严……每个人要过自己的日子，我的人生不应该被政客和财团操作，我比较不甘心。”洪箱姐这段话道出了“务农是一种生活的选择”。任何人，任何政府，甚至任何潮流都不能剥夺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湾宝农民长期抗争要守护的是土地，是家，更是一种生活。

如同洪箱姐所讲，做农的节奏可以自己调节，这种生活的自主性往往是大部分新农人曾经被剥夺的，又是最想拥有的。新农人李行以前的打工生活便是如此。李行在19岁中专电子专业毕业后，就跑到广东东莞开始了九年的打工生涯。刚读书出来时，没有什么技能，社会经验也少，只好当一线生产的工人。一线生产是流水线作业，要求人的精神高度集中，而且重复同样的动作达12小时。这些工厂讲究高效率，每位工人的速度都要与机器的步调一致。厂长总觉得李行的动作慢，就常常骂他。这段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工业化的生产模式把人也当成机器，根本是在消磨人的本性。而做农活，你可以根据今天的心情与身体状况，或是当下的天气条件来自主安排时间长短和速度。

为了守护湾宝那片土地，当地农民勇敢地拒绝资本，不顾生命安危多次前往政府楼抗议。新农人抛弃主流宣扬的都市生活，选择被亲人，同学和朋友都唾弃的农村生活，这不也是一种守护吗？他/她们在面对家庭反对时所做的种种努力也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2009年李行决定返乡务农，可是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甚至被怀疑得了精神病。在家的那段时间，他过得很压抑，常常被家人往外赶，自己却又不想外出打工。在家庭的压力下，2010年他别无选择又到东莞打工。因为真的不喜欢，2012年他还是回到家，希望能得到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改善与父母的对立关系。正如他写到：“今年3月再一次回到家，希望自己能突破内心的障碍，能以爱去面对家人和别人的质疑，过一种简单自在的农耕生活。但没有过几个月，我就又意识到了生活或自己的内心从来都没有按自己的预期发展过……我说我还是想出去，他们（父母）默许。一时悲观上涌，当时我想，可能回不了家了。”^①2013年1月，当我走访正在实习的李行时，我们谈起了他与父母的关系。他告诉我：“那次跟张君聊到这个事情，说我心里面有一种压力感。他就说‘还是这样过’。这句话把本来很乱的我理顺了。我把自己的重心找到了。不管父母压力怎么样，自己的婚姻怎么样，这些外在的东西都不能改变自己去实现认为适当的生活方式，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的。不会因为父母的压力去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因为惧怕去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可见，李行对自己想过的生活非常明确，也非常的坚定。这也许就是新农人在前进路上最需要的内心力量吧！

改变，从自己做起

然而这种生活又该如何过好呢？有些新农人想象的务农生活是简单的，慢节奏的。可是农是靠天，得赶季节，赶天气，错过了就只能再等一年，甚至先前的功夫会白费掉。2012年收割谷子的过程便让合初人自然农园的新农人对“抢收”有了深刻的理解。我们四五个新农人连续两星期每天早上八点就出工，割到中午十一点，下午三点半继续，等到天黑八点多才收工。这种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挑战了我们的极限，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选择：这是我们想过的生活吗？天黑回来的路上，我们看见旁边田里还有打电筒收割谷子的老农。大家讨论著，都说新农人与老农就是不一样——我们更注意把握劳动的强度，不让自己累著。然而第二天的大雨让我们恍然大悟，老农打电筒不是因为不知道累，而是要趁下雨前抢收完谷子。这场大雨拖延了我们收割的时间，晒谷子的好天气也就错过了。到现在，我们还有几百斤的谷子没能晒干入仓呢！真后悔当时没有学老农打电筒，也更明白了农民那种任劳任怨的心境。要达到这种心境，新农人应该怀有谦卑的心，在实践中学会把握节气更替与农事安排，学会协助大自然来获得它给予人类的恩惠。务农的生活才会变得既能自主，又有收获。

香港经过城市化发展，几乎没有了农村，农地和农人。可是在这次研习会上我们看到，香港菜园新村农业先锋队在建村初期便利用向附近村落借来的农地耕种，继续发展农业，并希望把所得盈利分给参与耕地的村民，或成为村中公共建设维修资金。我们还看到了新生活馆^⑨农场的城市青年租地来务农，因为他/她们深刻认识到要保护农村，必须亲身学习和实践务农，重建与土地相连的生活。身处城市化程度如此高的香港，以冯汝竹大姐为代表的农人没有沮丧和抱怨，而是用实践务农来证明“农”的价值。香港农业处在消亡的边缘，新生活馆农场的城市青年没有做犬儒主义者，而是脚踏土地开始务农。他/她们用CSA模式联结起更多香港人与农，与土地的关系。

同样，新农人张明涛也是看到CSA模式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开始学生态农业。他在大学期间曾休学一年到基层支农，亲历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以前别人拍我的照片都说是愤怒像，是典型的愤青。以前的想法是改造农村，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信心很大。但忽略了一点，在不改变自己的情况下是不能改变世界的，总觉得是世界的问题，自己没有问题。”张明涛告诉我，亲自做农民，干农活儿，是在弥补自己以前缺失的农村劳动教育。正如他说：“在种地过程中，人要对自然，对土地有基本的尊重，所以农民种地都是需要低著头，弯著腰。不能想象，一个扬著头，趾高气昂的人如何做到在地里耕地。”

新农人张桃则是因为对现有的教育制度不满意，选择了做生态农业。她认为学校教育不应该只看重成绩，而应该关注孩子的心灵成长。一些经历也让她很失望地发现，有些人即使是在私下交谈也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真诚。她开始在学校上课不能安稳，便看小说，玩手机，看自己喜欢的杂志。一次偶然的的机会在《青年文摘》上看到报道曾经是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¹⁰⁰负责人之一的石嫣的文章，其中有介绍CSA。“我最看重的是CSA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人与人的关系。看了后我很激动，心想小毛驴在北京太远去不了，于是在网上搜索找到了做CSA的安龙村，就把地址抄下来。反正对上学也没有了兴趣，我就跟妈说不参加高考，要去种地。她很反对，但我当时对CSA的向往，有一种狂奔的感觉。管不了这么多了，拿著地址我就去到了安龙村，找到高家，开始种地。”怀著可以改变人际关系的期望，张桃两年后最大的收获却是改变了自己。她说：“以前我总想把对这个世界的批判和自己的想法通通讲出来，现在我觉得没有好大必要了。有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标榜得太高了。当你怀著这个心态去给人家说，我自己好了不起，好伟大，做的事好有意义，其实在别人心头压根就不存在这样。”这番话，提醒著我们这群新农人，应该警惕傲慢的心态，懂得弯腰种地的谦卑。

四年前的我，何尝不是有些傲慢呢？那时我很有幸成为“生态，生计，文化与可持续和平”行动研究计划¹⁰¹的研究助理。我们研究团队跟著几位和平妇女在她们的社区推广生态耕种。我把从书本上学到的有关生态农业的知识相当自信地告诉村民，试图说服他/她们放弃使用化肥农药，尝试生态的耕种方法。他/她们反问我，一家人的口粮怎么有保障，我无言以答；他/她们细问我，具体的生态农业技术操作过程如何，我也说不出一二来。我还自以为是地心里责怪村民，怎么不懂得环保的紧迫性，不知道健康很重要。当时，我脑子里装满了理论，觉得自己知道得比别人多，也比别人想得透彻，更有批判，甚至不能包容和理解别人做出与自己理念背道而驰的行为。经过研究团队的种种努力，两年后真正转变种植方式的村民很少。面对这个现实，我变得很无助，很无助——自己那么努力想要改变的世界却没有按自己想象的发展。我越来越没有了底气，开始反问自己：一点务农的经验都没有又怎么能说服别人？自己都没有改变又怎么可以责怪别人没有改变？经过痛苦的思想挣扎，我意识到自己太自负，应该放下所谓的“远大抱负”，寻找当下的着力点。唯有返乡学种地，才能让我真正明白推广生态农业的瓶颈到底在哪里。

学种地，不是那么简单，比从书本上学习理论难多了。收谷子时，老农怎么就知道第二天要下雨呢？天气预报可没有说呀！老农很淡定地指著天空笑著说：“天气预报没说，老天爷说了算不嘛？”我望著一样的天空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原来观测风云变化也是务农所必须的智慧。其实做农需要掌握百科知识，包括天文学，植物学，生物学，土壤学等等，还需要把所有这些知识融会贯通。我之前了解的农业知识不仅是理论上的纸上谈兵，还是片面的，局部的，被分割的。现在我要突破自然学科的界限，用整全观去认识由无数生命联结的“自然”和“农”。而老农的智慧是多年务农所积累的经验知识，需要耳濡目染的传承，不可能一蹴而就。我想，拿到一个专业的大学文凭前前后后都花了20年时间，要学涉及多个专业的“务农”也许是一辈子的事儿，现在才刚刚开始。

像香港新生活馆农场的朋友一样，张明涛，张桃和我通过务农正改变著自己。改变的是对农人的尊重，对自然的谦恭态度。

休闲农业·修行农业

这次CSA研习会上，我们讨论了农的多元价值，农的生活内涵。而新农人在实践务农中，又丰富著农的故事。

今年初春，我们到有二十几年生态种植经验的周诗禄老师那里去学旱地育秧。他弄的秧床，方方正正，对尺寸的要求如科学家一样精确。我们这些新农人在旁边观看，不知道应该如何插手。好不容易我鼓起勇气想帮周老师整理泡在水桶里的薄膜。我笨手笨脚的样子弄了半天也没有捋顺，还洒了一地水。周老师很客气地说：“你慢慢的，等一下我来。水很珍贵，要珍惜水。”没想到周老师做农不仅对技术和质量要求高，还会想到资源的可贵。而我却只为了怎么弄好薄膜，眼中却没了“水”。育秧的程序很多，弄碎土、洒碎土、浇水、洒种、盖膜。周老师对每个步骤都一边操作一边讲解。我们脑子记不住，便用笔记。又怕自己操作时看文字记录找不到感觉，就用起了手机来拍照，还进行了微博直播。在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只能打打下手。也许是见识到我们连务农的基本知识都没有，周老师就叫我们干脆站在一旁观看就是。他重复好几次地告诉我们：“种田很辛勤哟！要吃得苦才行。你们做做休闲农业算了。”休闲农业？我们几个新农人都哈哈大笑！周老师担心我们靠务农填不饱肚子，得找个糊口的工作，有空闲时间再来做做农活玩。我们可是想要用农来养活自己的，只是现在的技术很有限，也就默认了周老师对我们的定位。

务农与整个自然的生命体都有关联。在田间劳作，远处传来各种鸟儿们的合唱曲，身旁有很多你叫不出名儿的花花草草，脚下有蹦来蹦去的青蛙和蟋蟀，手边有被惊吓到的蚯蚓和蚂蚁。而我们种下的作物便在它们的陪伴下成长。这些生命体用非人类的语言互相沟通著，也与我们相通著。务农便是让你学会体察各种生命之间的联结。

我们走在做农后回家的路上，或是带著些许的疲惫，或是带著小小的成就感。看著身边的花草树木，它们大小不一，高矮不同，但是每一个生命都努力地往天空伸展。再细看，有的已经凋谢，完成了一个生命的周期。我们不再谈论，开始专注一路上所呈现的生命形式，不去想它以前是什么样子，以后又会怎样。在此刻，我们就是静静地在欣赏，如实地看著它们，没有由我们的头脑创造当下之外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务农生活，我们学著放下。放下担忧，放下恐惧，放下愤怒，放下埋怨，放下执著的某些观念……于是我们新农人自称是在做“修行农业”。

无论是老农眼中的“休闲农业”，还是自己心中的“修行农业”，那都是新农人演绎的农的内涵吧！

- ① 农园成立于2009年12月，位于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租用耕地50亩、闲置希望小学一所。农园是重庆民间科研公益组织合初人文化传播社推动的一个城乡互助平台，是一个集生态农业技术试验推广、CSA模式本地化创新实践、农耕体验教育、社区文化建设、青年志愿者培养的示范性教育基地。
- ② 攀枝花和心园种养养殖专业合作社简介见附录一。
- ③ 湾宝社区发展协会简介见附录一。
- ④ 冯汝竹积极参与土地正义联盟成立的八乡绿色生活社，机构简介见附录一。
- ⑤ “生态农业·新农人实习计划”从2012年初开展，由社区伙伴资助，合初人实施，在川渝地区搭建返乡青年生态农业学习与实习的平台。该项目以有一定生态农耕经验的农户或非营利农场为实习点，招募有意愿返乡的年轻人作为实习生，帮助他/她们系统和深入地学习理解生态农业，以及学习如何构建自己未来在乡村的生活。

- 6 “新农人”这个说法是社区伙伴四川生态农业团队在跟尝试返乡务农的年轻人一连串的讨论中产生的，特别是要回应长期以来对“农民”这个说法的偏颇和蔑视。人们骂人时会说你是“农民”，这个名词带著很多贬义，代表愚昧、无知、不科学等等。提出“新农人”是要为农民正名：农业本身是一门经长期反复实践验证的知识体系，内里包含的学问广大深博。一名称职的农民不但是农耕科学的理论家，更是实践者，应该像其他工作般，受到尊重。而“新农人”们，则肩负著总结和转递对农民和农业的这个理解和信息使命。新农人新在哪里呢？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新农人返乡后会有了从外面学来的新知识和经验；可以有更多可能过半农半X生活；有人认为他/她们具有反思主流发展主义和城乡分割的意识等。
- 7 大部分新农人对主流发展主义、城市化、乡村衰败和可持续生活有所反思。CSA是他/她们推动乡村发展，建立城乡联结的一个途径。因为通过CSA可以销售健康农产品，重建农村可持续生计；同时让城市消费者吃到健康食品，开始多关注农业。更重要的是，CSA的运作可以建立人与人的互信，改善人与土地越来越分割的关系。这些关系的重建正是新农人尝试可持续生活的基础。
- 8 摘自刊载于合初人网页上李行的文章：《大风农场实习感受——那些感动我的事》。
- 9 新生活馆的成立与菜园村的保育运动有关。一群来到元朗八乡支援村民的城市青年，认为要保护农村，必须亲身学习和实践农务，重建与土地相连的生活。他们跟随香港永续农业关注协会的袁易天老师学习永续农业，建立菜园村生活馆。2011年初，菜园村被清拆，他们在八乡谢屋村找到几万尺农地，建立起新生活馆农场。新生活馆在选择作物时会考虑如何令土地愈种愈肥沃，强调不能一味向土地苛索。
- 10 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建于2008年4月，占地230亩，位于北京西郊著名自然风景区凤凰岭山脚下。小毛驴市民农园在种植方式上采用自然农业技术，尊重自然界的多样性，遵循种养结合的原理，重视传统农耕文化和乡土知识的传承；在经营模式上采取CSA的经营理念，为市民提供蔬菜配送和菜地租种服务；倡导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并希望重建乡村和城市社区和谐发展、相互信任的关系。
- 11 该计划于2008年开始，由社区伙伴部分出资，香港岭南大学群芳文化研究及发展部部分出资并实施，邀请了11位在生态农耕，城乡互动，社区建设等方面默默耕耘的中港台和平妇女和组织参与，共同探索生态，生计，文化和可持续生活等范畴的关系，在妇女的日常实践中创造和建设可持续的和平和生活。